

公办养老院难进 民营养老院太贵

明天, 我们如何养老?

5月4日下午,在成都的人民公园,85岁的王爷爷逛累了,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王爷爷身体硬朗,却担心3个子女今后的养老问题。“他们每人都只有一个孩子,孙子将来压力很大。”王爷爷担心儿女的赡养,黄田坝社区70岁的李婆婆则更关心自己的养老,她在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排了一年多队,都没有成功入住。

这个群体正在越来越庞大。截至2013年底,全国老年人口2.02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4.9%。

与人口老龄化局面越来越严峻相伴随的是,政府不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发展养老服务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四川将力争在“十二五”末形成“9073”养老格局,即90%的老年人通过自我照料和社会化服务实现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通过社区组织提供的各种专业化服务实现社区照料养老,3%的老年人通过入住养老机构实现集中养老。然而现实状况却是,居家养老服务覆盖面较窄、社区养老基础设施薄弱、机构养老床位数量低于国家标准,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每一天我们都离养老这个话题越来越近。不管年轻还是年长,现在我们就应该关心这个话题:以后我到哪里去养老,或者,我家的老人怎样养老?

三位老人的晚年选择

越来越多的家庭步入1:2:4结构,即一对夫妇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同时,还要赡养四个甚至是更多的老人。何处安放自己的晚年,老人们也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王爷爷家住成都锦里东路,每天吃过午饭,他都步行去人民公园逛逛。85岁的他身体还不错,步行让他有安全感,“必须每天都要走路,不走路的话担心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老伴80岁,两人生

活能够自理,平时喜欢逛公园、下棋打牌和读书看报。王爷爷有退休干部的养老金,看起来他和老伴的晚年生活还不错。因为不想影响子女,也更喜欢单独住,老两口已独自生活了10来年。之前孙子孙女小的时候,还在儿女家给他们看过孩子。

王爷爷不担心自己和老伴,却为儿女的养老发愁。他有两儿一女,但三个儿女都只有一个孩子。“他们这一辈,养老的问题比我们更难,到时养老院可能是个去处。”

71岁的成都市民文先生戴着眼镜,喜欢读书看报,关注新闻,尤其关注养老方面的报道。谈起成都的几大公办养老院,文先生特别清楚,“光华大道那里有一家,龙泉有,这些我都去过,很了解那里的状况。”

考察多家养老院,是因为文先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能指望孩子养老。”文先生有3个女儿,分别在北京、贵阳和成都,工作都不错。文先生和老伴生活在一起,每到夏天就去都江堰找农家乐避暑。

谈起今后最希望在哪里养老,文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养老院,最希望的是公办养老院。“老龄化形势越来越严峻,政府应该多办养老院,尤其是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养老院。”文先生认为民办养老机构收钱的项目太多,“有些养老院的健身场所要收钱,心理咨询也要收钱,虽然床位费和伙食费不算贵,可是加上这些价钱就太高了。”

王家拐街道文庙社区的书记艾全利最近下院落发现,皇城公寓的张婆婆了却了一桩心事,“考察很多家以后,张婆婆终于决定去崇州的一家养老院。”张婆婆有4个儿女,跟社区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她很明确地说:“现在要养老,儿女是靠不住的。”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像文先生和张婆婆一样,接受养老只靠儿女并不现实的情况。这并非儿女不够孝顺,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儿女也逐步变老,并且有他们需要去应对的生活。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步入1:2:4结构,即一对夫妇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同时,还要赡养四个甚至是更多的老人。这些,都成为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一床难求的公办养老院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公办养老机构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为腾出更多床位,主管部门和养老院都在积极想办法,却依然难以缓解一床难求的状况。

前不久,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书记赵明和院内工作人员去黄田坝社区介绍养老院情况,被一位老人“批评”了。

“我们正给居民做介绍,一位婆婆说你们别介绍了,说得再好进不去也没用。”赵明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位婆婆排队等候入住第一福利院,等了一年都没成功。

按照《成都市公办养老机构轮候入住暂行规定》,公办养老机构要在满足政府保障人员即“三

无”老人供养前提下,预留剩余床位30%给政府保障人员,40%满足特殊群体老人,最后30%才用来满足普通老年人。目前该院共576张床位,预留48张床位给政府保障人员,其余均已住满。入住的除由政府出资供养的“三无”老人,还有需要自费的特殊群体老人和普通老年人,普通老年人也被称为社会老人。而在排队时,3种群体的老人也是通过3个通道排队轮候。

“目前有意向入住在排队的社会老人有200多个,不确定会等待多长时间,可能前面的人放弃了或者联系不上,后面的人就能很快入住,但等待1年多也是有可能的。”赵明还通过另外一件事讲述了床位的紧张,“没有床位,有人托关系、找熟人想安排一个老人都安排不进来。”

“一床难求”的局面也在成都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存在。

3月1日,第二福利院公布的人住公示显示,该院共设置床位1000张,至2月28日共有收养人员381人,自费人员379人,合计760人,剩余床位240张。除去设置60张用于医疗用床,还能提供空余床位180

张。仅一个多月后,4月8日该院公示普通床位已满,普通轮候通道已登记轮候22人。

为腾出更多床位,养老院也在想办法。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自2008年搬到目前在光华大道的新址后,就空了一层楼共24个标间48张床位预留给“三无”老人,但因“三无”老人大部分转移到成都市第三社会福利院,6年来该院的预留床位都是空的。“我们准备对这一层楼进行改造,留出部分房间给社会老人。”但这些房间,对正在排队等待的社会老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过去有些老人去医院看病会要求保留在院里的床位,现在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规定外出就医住院超过1个月就不再保留,要办理出院手续。“这样也是为了让床位浪费,尽量发挥最大作用。”过去有老人入住标间,宁愿多出个床位的钱也不喜欢跟其他老人住一起,“以后我们会尽量劝说,加钱也不行,让这种情况不再出现,毕竟是床位资源的一种浪费。”赵明说。

2020年迎“养老难”小高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规划(2011-2015年)》,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2.48亿,老龄化水平达17%。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人口每三个人中有一

个老人。在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成都老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隋国辉看来,在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之前,约在2020年左右,就将迎来“养老难”小高峰,同时养老服务行业也面临着系列机遇和发展关键期。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陈传书在接受采访时曾介绍,我国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曾出现生育高峰,一年生育2000万-3000万婴儿,现在则下降到每年1200多万婴儿。隋国辉分析,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群进入2020年后逐步成为“70后”,而我国又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这部分人群中相当一部分只有一个子女,将要面临“上有

多老下有小”的局面。推测进入2020年后将迎来“养老难”小高峰。

“从全世界来看,居家养老都是基础。”隋国辉说,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02亿,无论何种养老机构都无法承载,不管从现实条件还是从老年人的主观意愿来看,大部分都是居家养老。居家养老不仅仅是家庭问题,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没有社区依托,就没有居家养老。”

同时,隋国辉认为,目前正在老去的人们一方面具有消费能力,一方面对“单纯指望儿女养老是靠不住的”有心理准备,对养老服务产业来说2020年也面临机遇。“预计到2020年,养老产业发展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华西都市报)